

胡適文集

3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胡适文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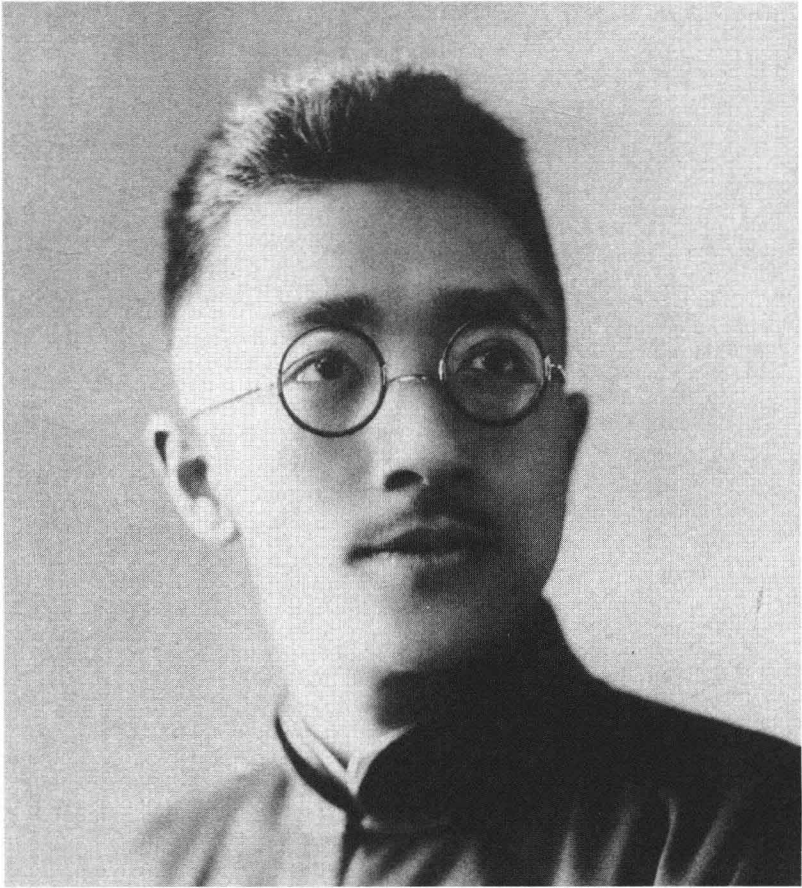
欧阳哲生 编

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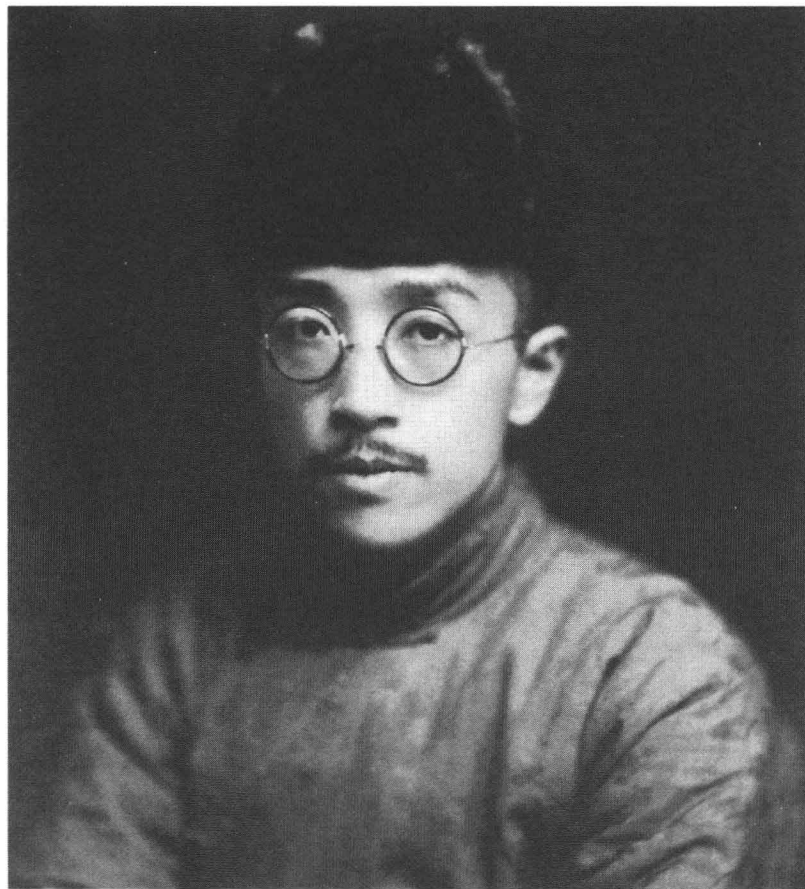
胡适文存二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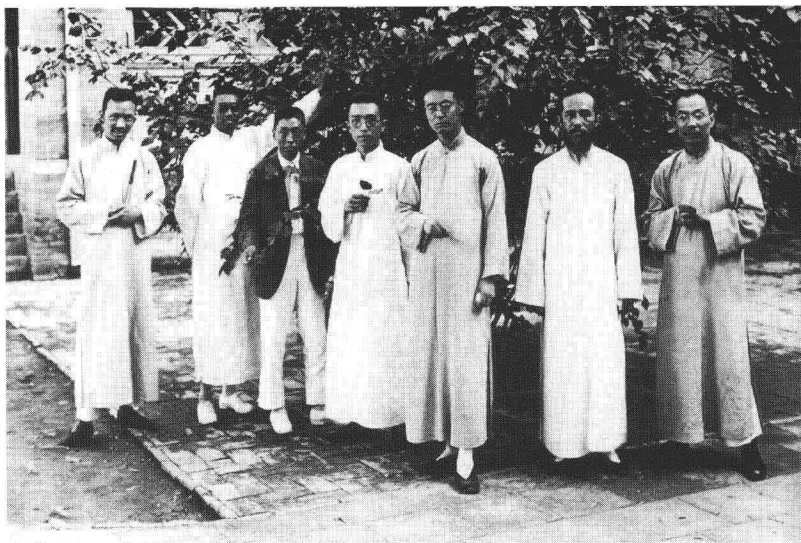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

1922年胡适摄于北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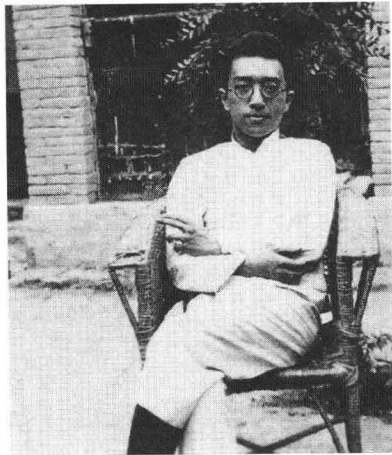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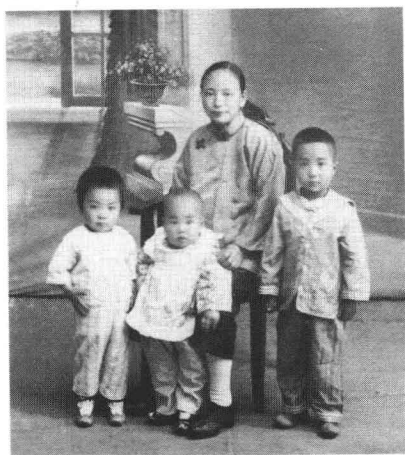


1921年冬的胡适。



上：1923年胡适与《国学季刊》编委会同人合影。从右至左：陈垣、朱希祖、顾颉刚、胡适、马衡、沈兼士、徐炳昶。

下：北京大学第二院大礼堂，胡适在北大任教时常在此处上课或者演讲。



上：胡适（右二）与高梦旦（左一）、郑振铎（左二）、曹诚英（右一）在一起。

下左：1924年胡适的三个孩子胡祖望（右）、胡思杜（中）、胡素斐（左）与江冬秀合影。

下右：胡适在北大任教时留影。



上：1924年9月，胡适（三排左二）与北大国学院同人（左起一排：董作宾、陈垣、朱希祖、蒋梦麟、黄文弼；二排：孙伏园、顾颉刚、马衡、沈兼士、胡鸣盛）在三院译学馆原址合影。

下：1926年胡适（二排右五）与伦敦中国学生会成员合影。

第三册说明

《胡适文存二集》，1924年11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，分平装（四册）、精装（两册）两种，六开本。以后重印多版，至1941年已出十二版。《胡适文存二集》所收文章，大都写于1922年1月到1924年9月之间，除个别的未发表外，基本上都已在报纸杂志上公开发表，或作为序跋收入已出书籍；有些文章收入本集时，胡适又作了大幅度修改、扩充，具体情形胡适在序中作了交待。1953年12月，台北远东图书公司印行《胡适文存》四集合印本。二集删去：《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》、《梁任公〈墨经校释〉序》、《论墨学》、《十七年的回顾》、《祝〈白话晚报〉》、《黄梨洲论学生运动》、《〈政治概论〉序》、《〈天乎帝乎〉序》、《我们的政治主张》、《我的歧路》、《国际的中国》、《一个平庸的提议》、《与一涵等四位的信》、《这一周》、《北京的平民文学》、《读王国维先生的〈曲录〉》诸篇。

此次整理出版《胡适文存二集》，系依1929年3月亚东图书馆所出第六版排印。原书无文章发表出处，现将每篇文章的出处，附注说明，供读者参考。

目 录

序/1

卷一

《国学季刊》发刊宣言/5

发起《读书杂志》的缘起/17

王莽(一千九百年前的一个社会主义者)/18

记李觏的学说(一个不曾得君行道的王安石)/24

费经虞与费密(清学的两个先驱者)/38

读《楚辞》/67

古史讨论的读后感/72

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/80

附录一 《清华周刊》记者来书/89

附录二 答书/90

附录三 《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》 梁启超/92

梁任公《墨经校释》序/113

附录一 梁任公先生来书/117

附录二 答书/120

论墨学/123

《章实斋年谱》自序/(收入《胡适文集》第7册,此处存目)

《淮南鸿烈集解》序/130

卷二

《科学与人生观》序/137

这一周(十一年六月至十二年四月)/359

卷四

吴敬梓年谱/425

《西游记》考证/447

附录 读《〈西游记〉考证》 董作宾/472

《镜花缘》的引论/479

跋《〈红楼梦〉考证》/502

附录 《〈石头记〉索隐》第六版自序 蔡子民/508

《〈水浒〉续集两种》序/513

《三国志演义》序/525

高元《国音学》序/531

赵元任《国语留声片》序/534

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/537

《中古文学概论》序/544

评新诗集/548

《尝试集》四版自序/(收入《胡适文集》第9册,此处存目)

《蕙的风》序/557

歌谣的比较的研究法的一个例/563

北京的平民文学/569

附录 谈北京的歌谣 常惠/574

《国语月刊·汉字改革号》卷头言/581

读王国维先生的《曲录》/584

序

《文存》的第一集，是十年十一月结集的。三年以来，又积下了五十万字的杂文。亚东图书馆里的朋友们帮我編集起来，成为《文存》第二集。汪原放先生特为此事远道跑来北京，住在我家里逼着我编定目录；章希吕、余昌之两先生担任校对：这都是我应该道谢的。

我本想分作四卷，第一二卷为讲学之文，第三卷为论政治之文，第四卷为杂文。但因为文字的长短，每册的厚薄，竟不能严格地拘守这个区分。有几篇稍长的讲学文字，如《崔述的年谱》，如《戴东原的哲学》，因未完篇，故不曾收入。因此，卷一与卷四不免有截长补短，互相移动的痕迹。

卷三的政治文字，大都是迁就朋友的主张，勉强编入的。《这一周》的短评，本无保存的价值。因为有朋友说，这种体裁在今日或以后的舆论界也许有推行的必要，所以我暂时留在这里。

卷二里《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》和《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》两篇，原是为《申报》五十年纪念册做的；《申报》馆另出有单行本。《申报》馆许我重印的好意是很感谢的。

这一集里也收有几篇三年前的旧作，也有一两篇是不曾发表过的。《费经虞与费密》一篇，是用旧稿《记费密的学说》，从头改作，比旧稿增多不止十倍了。

《文存》第一集出版时，我曾说：

我自己现在回看我这十年来做的文章，觉得我总算不曾做过一篇潦草不用气力的文章，总算不曾说过一句我自己不深信

的话：只有这两点可以减少我良心上的惭愧。

我现在拿这两点来审查这第二集，觉得还不至于自己痛打自己的嘴巴。所以我还用这两句话来介绍这几册文字给我的读者罢。

十三，九，廿三 胡适

胡适文存二集 卷一

《国学季刊》发刊宣言

近年来,古学的大师渐渐死完了,新起的学者还不曾有什么大成绩表现出来。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时期,只有三五个老辈在那里支撑门面。古学界表面上的寂寞,遂使许多人发生无限的悲观。所以有许多老辈遂说,“古学要沦亡了!”“古书不久要无人能读了!”

在这个悲观呼声里,很自然的发出一种没气力的反动的运动来。有些人还以为西洋学术思想的输入是古学沦亡的原因;所以他们至今还在那里抗拒那他们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西洋学术。有些人还以为孔教可以完全代表中国的古文化;所以他们至今还梦想孔教的复兴;甚至于有人竟想抄袭基督教的制度来光复孔教。有些人还以为古文古诗的保存就是古学的保存了;所以他们至今还想压语体文字的提倡与传播。至于那些静坐扶乩,逃向迷信里去自寻安慰的,更不用说了。

在我们看起来,这些反动都只是旧式学者破产的铁证;这些行为,不但不能挽救他们所忧虑的国学之沦亡,反可以增加国中少年人对于古学的藐视。如果这些举动可以代表国学,国学还是沦亡了更好!

我们平心静气的观察这三百年古学发达史,再观察眼前国内和国外的学者研究中国学术的现状,我们不但不抱悲观,并且还抱无穷的乐观。我们深信,国学的将来,定能远胜国学的过去;过去的成绩虽然未可厚非,但将来的成绩一定还要更好无数倍。

自从明末到于今,这三百年,诚然可算是古学昌明时代。总括这三百年的成绩,可分这几方面:

(一) 整理古书。 在这方面,又可分三门。第一,本子的校勘;

第二,文字的训诂;第三,真伪的考订。考订真伪一层,乾嘉的大师(除了极少数学者如崔述等之外)都不很注意;只有清初与晚清的学者还肯做这种研究,但方法还不很精密,考订的范围也不大。因此,这一方面的整理,成绩比较的就最少了。然而校勘与训诂两方面的成绩实在不少。戴震、段玉裁、王念孙、阮元、王引之们的治“经”;钱大昕、赵翼、王鸣盛、洪亮吉们的治“史”;王念孙、俞樾、孙诒让们的治“子”;戴震、王念孙、段玉裁、邵晋涵、郝懿行、钱绎、王筠、朱骏声们的治古词典:都有相当的成绩。重要的古书,经过这许多大师的整理,比三百年前就容易看的多了。我们试拿明刻本的《墨子》来比孙诒让的《墨子间诂》,或拿二徐的《说文》来比清儒的各种《说文》注,就可以量度这几百年整理古书的成绩了。

(二)发现古书。清朝一代所以能称为古学复兴时期,不单因为训诂校勘的发达,还因为古书发现和翻刻之多。清代中央政府,各省书局,都提倡刻书。私家刻的书更是重要:丛书与单行本,重刊本,精校本,摹刻本,近来的影印本。我们且举一个最微细的例。近三十年内发现与刻行的宋、元词集,给文学史家添了多少材料?清初朱彝尊们固然见着不少的词集;但我们今日购买词集之便易,却是清初词人没有享过的福气了。翻刻古书孤本之外,还有辑佚书一项,如《古经解钩沉》,《小学钩沉》,《玉函山房辑佚书》,和《四库全书》里那几百种从《永乐大典》辑出的佚书,都是国学史上极重要的贡献。

(三)发现古物。清朝学者好古的风气不限于古书一项;风气所被,遂使古物的发现,记载,收藏,都成了时髦的嗜好。鼎彝,泉币,碑版,壁画,雕塑,古陶器之类:虽缺乏系统的整理,材料确是不少了。最近三十年来,甲骨文字的发现,竟使殷商一代的历史有了地底下的证据,并且给文字学添了无数的最古材料。最近辽阳、河南等处石器时代的文化的发现,也是一件极重要的事。

但这三百年的古学的研究,在今日估计起来,实在还有许多缺点。三百年的第一流学者的心思精力都用在这一方面,而究竟还只有这一点点结果,也正是因为有这些缺点的缘故。那些缺点,分开来说,也有三层:

(一) 研究的范围太狭窄了。这三百年古学,虽然也有整治史书的,虽然也有研究子书的,但大家的眼光与心力注射的焦点,究竟只在儒家的几部经书。古韵的研究,古词典的研究,古书旧注的研究,子书的研究,都不是为这些材料的本身价值而研究的。一切古学都只是经学的丫头!内中固然也有婢作夫人的;如古韵学之自成为一种专门学问,如子书的研究之渐渐脱离经学的羁绊而独立。但学者的聪明才力被几部经书笼罩了三百年,那是不可讳的事实。况且在这个狭小的范围里,还有许多更狭小的门户界限。有汉学和宋学的分家,有今文和古文的分家;甚至于治一部《诗经》还要舍弃东汉的《郑笺》而专取西汉的《毛传》。专攻本是学术进步的一个条件;但清儒狭小研究的范围,却不是没有成见的分功。他们脱不了“儒书一尊”的成见,故用全力治经学,而只用余力去治他书。他们又脱不了“汉儒去古未远”的成见,故迷信汉人,而排除晚代的学者。他们不知道材料固是愈古愈可信,而见解则后人往往胜过前人;所以他们力排郑樵、朱熹而迷信毛公、郑玄。今文家稍稍能有独立的见解了;但他们打倒了东汉,只落得回到西汉的圈子里去。研究的范围的狭小是清代学术所以不能大发展的一个绝大原因。三五部古书,无论怎样绞来挤去,只有那点精华和糟粕。打倒宋朝的“道士《易》”固然是好事;但打倒了“道士《易》”,跳过了魏、晋人的“道家《易》”,却回到两汉的“方士《易》”,那就是很不幸的了。《易》的故事如此;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、《三礼》的故事也是如此。三百年的心思才力,始终不曾跳出这个狭小的圈子外去!

(二) 太注重功力而忽略理解。学问的进步有两个重要方面:一是材料的积聚与剖解;一是材料的组织与贯通。前者须靠精勤的功力,后者全靠综合的理解。清儒有鉴于宋、明学者专靠理解的危险,所以努力做朴实的功力而力避主观的见解。这三百年之中,几乎只有经师,而无思想家;只有校史者,而无史家;只有校注,而无著作。这三句话虽然很重,但我们试除去戴震、章学诚、崔述几个人,就不能不承认这三句话的真实了。章学诚生当乾隆盛时(乾隆,1736—1795;章学诚,1738—1800),大声疾呼的警告当日的学术界道: